

2019年的考研初试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对于一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来说,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复试和导师的选择。而其中如何选到心仪的导师是大多数学生关注的问题。

在网上考研相关的帖子中,经常能够见到诸如“××导师如何”“××专业哪个导师好”的问题,更有一些“过来人”建议学弟学妹擦亮眼睛,仔细分析,避免未来的研究生生涯中“被放弃”或是“白当苦力,被抽干榨尽”。而近期不时被媒体曝出的研究生与导师存在矛盾,甚至导致自杀的案例,更使得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那么,中国的研究生和导师到底怎么了?如此紧张的导学关系是只有中国才存在吗?国外导学关系上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几位具有海外经历的一线教师和学生,让他们谈谈海外所想。

世界导学关系差异

眼看寒假即将到来,但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王丹妮却并不快乐。她最近正在为导师安排的工作而感到苦恼。

“导师担任行政职务又有学术任务,很繁忙,于是也给我安排了一些辅助跑腿的工作,但是最近觉得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精力被这些繁杂事务占去,自己只能靠碎片化的时间学习、做学术。”王丹妮说。

像王丹妮这样因为各种原因在与导师关系上存在烦恼的学生并不少见。

在《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年12月刊登的文章《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经过对3932名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及研究后发现,59.69%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融洽,36.29%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平淡,3.46%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紧张,另有0.56%的硕士研究生表示自己与导师是敌对关系。

那么,如此紧张的导学关系只有中国才存在吗?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袁进浩看来,学生与导师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存在。“我曾在日本高校任教。在日本,导师的地位很高,受到学生的尊敬,但是我也见过很多学生与导师间存在矛盾,甚至有学生对导师进行投诉等情况”。

研究生教育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在随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师徒式的培养模式。此后,美国在其基础上不断进行调整、创新,最终其研究生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熟并让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

而在研究生起源的欧美国家,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与中国较为不同。对此,曾在欧洲某高校交换学习过的王丹妮深有感触。

“在那里,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会更加



导学关系乱麻如何断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纯粹一些,导学间除学术上的交流外,一般没什么生活上的交流。”王丹妮说,国外很多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更类似于国内的专业硕士,因此导师的概念不是很强。

对此,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表示肯定。根据其自身的海外经历,他告诉记者,在欧美国家导学关系的确定会更加直接纯粹,且相处的界限较为分明,除学习上的事宜交流外,师生间并不会相互干涉私事。而在中国,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则更加紧密,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得中外导学关系差异鲜明。

“在国外,导师与学生是一对利益共同体,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互相协作、共同进步。导师会在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制定课程、研究训练等。”喻海良说。

直视导学矛盾的背后

人与人相处,摩擦和矛盾很难避免,诱因有很多。那么,导学矛盾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

“在我看来,很多导学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沟通问题。”喻海良分析道,“国外导师

对研究生和博士生做什么划分得很明确,往往学生一入学就已经明确地知晓。而中国的学生很多不清楚成为研究生到底要做什么,对未来没有预期和准备,因而之后产生的困惑和矛盾也就更多。”

作为一名培养过很多研究生的一线教师,喻海良十分重视与学生间的沟通。在他看来,导师和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很多时候存在差异,导师如果不注意学生的能力差异和反馈,学生也不主动去找导师沟通,那么矛盾就会产生,随着时间积累,最终可能导致很多不好的结果。

而在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王鸿飞看来,之所以有时很难及时、全面地沟通,研究生的体量是一大原因。

“比如在美国,一个系或院的研究生数量与我国一个系或院每年上百人不同,学生数量不会太多,每个学生都由三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王鸿飞说。

除此之外,他认为,我国在研究生的基本建构和制度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很多学生在对未来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成为研究生,而学校对于研究生应该做什么没有具体的规定。

对此,王丹妮表示,个别导师还在分配一些不在教学范围内的任务,而作为学

生,有时很难拒绝导师的要求。

“导师在开口提要求的时候,基本已经把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你了,征求意见实际上更像是通知一下。此时,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导师都会‘想办法’替你解决问题,然后继续让你负责他分配的任务。这样矛盾就产生了。”

在美国,学生的培养计划往往是在师生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非中国导学关系那样“事事包办”。

2017年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的《导师与研究生协议书》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协议书分为导师对学生的承诺和学生对导师的承诺,这充分体现了“导学关系”上的双向选择、双方协商、互相负责的特点,也许这才是研究生与导师相处的最佳状态。

借鉴导学问题的良策

那么,面对如今复杂多变、解决起来盘根错节的导学问题,在放眼世界,导学关系后,是否有应对的良策呢?

根据《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导学关系处于敌对的研究生中,90.91%的

硕士研究生形容自己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如同老板与员工。处于紧张状态的研究生中,76.47%的硕士研究生形容自己与导师的关系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王鸿飞表示,与中国高校不同,美国高校对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划分更为精细和明确,在一个专业方向上,原则上不会同时设置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一般是上研究生班,没有博士研究生那样有明确的指导导师。而导师与博士研究生之间更多是“师徒”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博士生不是“老板”的“劳动力”,而主要是接受相关的研究训练,将来有能力有机会传承发扬并光大学术的传统。

“因此,现在有些导师将研究生、博士生当做劳动力或者产品,自己是‘老板’,这样的思考方式是不对的。”王鸿飞说。

对此,喻海良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就像美国导师不会让研究生做横向课题一样。横向的课题研究、追赶进度等是教师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学生的责任。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导师要以培养学生为目的,从培养学生的角度出发指导研究生进行训练和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当做劳动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高校还应如同日本高校一般建立起严格、完善的制度,设立专门处理导学问题的机构,让导学问题有法可寻、有法可解,而不是在问题产生后一团乱麻。”袁进浩说。在日本,学生可以对导师的一些不良行为或问题向相关的委员会进行投诉,如果一位导师遭到了多位学生的同时举报投诉,调查结果情况属实的话,会暂时停止导师招生,并把现有的学生转给其他导师。

“上级部门的确需要制定维护研究生权利的实施规范,学校也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将实施规范整理成细则,设立委员会,正风正纪。”王丹妮从学生的角度补充道,要让研究生们意识到维权是有用的,这样才能让研究生敢于发声。

而从教师的角度出发,王鸿飞补充说,要健全整个研究生教育的体制机制,“很多研究生自身由于情感、家庭等产生的心理问题,仅靠导师疏导是不够的,导师在发现后还需要有专门、专业的机构人员进行沟通和辅导,防患于未然”。

除此之外,王鸿飞与袁进浩都建议,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建立起淘汰制度,进而保证研究生的质量。

在美国,每年每个系能够顺利拿到学位的人数并不多,特别是在博士阶段,最终还要淘汰将近30%的学生。“我在美国读书期间,第一学期后系内就淘汰了约20%的学生,最终拿到博士学位的比例大概是2/3。”王鸿飞说。

“事实上,在导学关系中,有时导师也处于弱势,面对一些本身学习态度不端正、换了几个导师都不行的学生,束手无策。”袁进浩说,因此,淘汰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维护师生间的关系。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

晋升正教授之后,该有怎样的奋斗目标

■郭英剑



正教授,是高校最高的学术头衔。成为正教授是学者新的人生起点。之后该如何确立未来的奋斗目标,是每一个成为正教授的学者所应思考的问题。

正教授,学术领域中最高的学术头衔

正教授(full professor)是世界上很多高校最高的学术头衔。英语的“教授”(professor)一词源于拉丁文,意指一位在艺术或者科学领域中的专业型或专家型人才。在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北欧地区,教授是一个较为稀缺的头衔,是一所大学中学术领域最高级别的职务,只有那些数十年如一日从事学术研究并公认取得很高学术成就者,才会被授予“正教授”头衔。据统计,在英国的大学中,只有大约10%的教师才能获得教授职称。

这一点,美国、加拿大的高校与美国有显著的不同。在北美,“教授”这个词,可以泛指所有教师,一位青年学者进入高校就是“助理教授”,往上是“副教授”,最后才是“正教授”。由此可见,北美的“正教授”,甚至是那些杰出的正教授,才能与英国的“教授”相提并论。

但无论如何,“正教授”是高校最高学术头衔已是公认的事实,它代表着一种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无论中外,很多学人一生所追求的梦想或者人生的一大梦想,就是获得这一最高的学术荣誉。

当然,无论中外,在“正教授”这一头衔之上,也都设有似乎比“正教授”头衔还要高的比如讲座教授、校聘教授、特聘教授、杰出教授等五花八门的教授头衔,但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从“正教授”的头衔演化而来的产物。说到底,他们也都是“正教授”之一种。对于学者而言,如果不想在获得正教授头衔之外再继续奋斗,成为“正教授”足矣。

在美国,成为正教授的平均年龄区间大抵会在30~40岁。在中国,现在“正教授”的年龄越来越偏向年轻化。过去,

一位学者要想成为正教授,可能要到50岁之后。但现在,一个努力奋斗者,40岁左右成为正教授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即便是在青年时期不易获得晋升机会的人文学科,在35岁左右成为正教授也已屡见不鲜。

我们知道,以美国为例,正教授可以不退休,或者说,退休与否全凭个人意愿。如此说来,如果35岁成为正教授,70岁退休(当然,也有学者到80岁还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那么,他就有35~40年的学术生涯。在中国,即便按照现在60岁退休的硬性规定,一位35~40岁年龄的学者在晋升为正教授之后,也至少还有20~25年相对漫长的学术年龄。

晋升为正教授,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迈上了人生的一个新台阶。无论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还是刚刚步入中年,在奋斗多年成功晋升为“正教授”之后,该如何确定自己今后的奋斗目标,也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成为正教授之后,该选择做什么

2019年1月6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了美国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学院(Marietta College)历史教授麦克丹尼尔(Kathryn N. McDaniel)的文章《你是正教授了。现在该干吗?》(You're a Full Professor. Now What?),其中表达了对于成为正教授之后的困惑与思考,相信对大多数人会有所启发。

麦克丹尼尔讲述了一个个人经历,他在成为正教授之后,开始感到多年的研究领域看上去不那么吸引人了,如果照此走下去,就会走进一条死胡同。未来该向哪里去?换句话说,未来要把自己的时间

与精力用在哪里?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在思考之后说,自己在考虑未来时,有四大问题值得反躬自省。

首先,这是否有趣?他说,之所以进入学术界,首先是感到好玩,对于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感到兴奋,也深深地被其所吸引。他在读研究生时,虽然很贫穷,似乎也毫无助,但一心一意沉浸其中,就因为热爱学术。因为热爱,才会觉得阅读、写作和从事的学术研究乐趣无穷。

他说,在晋升为正教授之后,知识世界之门向自己敞开,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告诉自己这个研究不够学术、那个方向不够有价值。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学术领域,并做自己的研究。为此,有些教授会在自己原来的领域或者相近的领域继续深入挖掘从而做出更大的成绩;而有些教授则完全转向全新的领域,远远超出自己原有的兴趣与爱好。换句话说,当上正教授之后,你可以去研究真正喜爱的学术领域。在教学上也是如此,自己可以选择并设计自己喜爱的教学话题。他说,因为自己乐此不疲,学生的反响也非常好。

其次,这是否有助于增长或者开发新领域?新的领域可以让自己重新成为一名学生,从而走出“舒适区”,在新的学术增长领域中找到新的学术兴趣。因为成为正教授,自己也完全有信心和能力去开拓新的领域。有些学者则会去参加学术会议,与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深入学术交流。总之,尝试新的道路,重新进入新的学习轨道,找到新的研究兴趣,完全可以成就学者新的人生乐趣。

再次,这是否与自己深切向往的事务相关联?很多时候,有些工作并不令人感到有趣,也不会有新的研究领域增长点,但却有机会针对自己所深切关心的

事物去表达个人观点,推动某项运动,倡导某种主张,那么,这就值得自己花时间和精力去做。麦克丹尼尔说,作为一名正教授,不仅意味着有丰富的经验,更意味着可以让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所拥有的制度权力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比如,为学校或者校外机构以及当地社区服务,他们因为教授的咨询意见和建议而受益。换句话说,可以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政治或社区服务。

最后,这是否让自己有足够的成就感?麦克丹尼尔指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做行政管理工作,可能少有事能够让自己内心深处那种再度提升的愿望。因此,找到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工作,将成为学者的一个重要选择。对于学者来说,学术发表、成果出版、课堂教学、行政管理、游走世界、公共事务等等,都可能成为让他们感到充实而有意义的工作。

麦克丹尼尔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去做一件事时,我都会想想上述四个问题,至少能够让我对其中一个问题说‘是’的事情,我就可以选择去做,否则就主动放弃。唯如此,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学者、教师和教授。”

正教授,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来说,在成为正教授之前,无论对学术是否真的有兴趣,大都会俯下身于投身教学,也会尽量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寻求更多的发表和出版机会,为自己晋升积累更多的学术成果。一旦成为正教授,大都会松了一口气,甚至一到几年时间就止步不前。但对于大多数正教授而言,依照惯性前行,乃是常态。

当下的中国,虽说成为正教授之后,还有更多的学术台阶在等着你,比如朝着更高的教授分级(从四级到一级)迈进,努力成为博导,抑或朝着长江学者、杰青、院士等更高的顶尖方向去努力,但总体来说,仅只守护着“正教授”的头衔而不为更高的台阶所动,则是大多数学者的选择。

在美国的一些高校,当一位学者晋升为正教授之时,大都会收到来自教授评审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会要求教授牢记一点:“正教授”这一角色其意味着要对学校事务与学校管理工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是,的,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包括校方和师生员工对大多数有着“正教授”头衔者的期待。这一点中外皆然。越是有更高头衔者,拥有的就越多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和人们更高的期待。

我自己是在36岁时被聘为正教授后,对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之一,就是今后多为他人着想与尽可能地多多帮助他人,以回报那些在自己成长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回报社会。这不是高调,而是可以做到的现实。

现在,我也经常对一些晋升为教授的青年老师说这样的话。这是一种回报,回报那些在你个人成长道路上对你提供了帮助的人——去帮助那些(像你当年那样)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小了,可以多为自己所在的系部、学院和学校多做工作;说大了,应该多为这个国家、社会乃至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成为正教授,意味着学者的人生有了一个起点。唯有及时更新人生目标,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才能在未来做出新的贡献,成为一名出色的“正教授”!